

不忘初心， 用我最好的年华，最好的技术去挽救患者

浙江省医师协会会长 郑树森

这么多年来，让我感到骄傲的是，我在最好的年华用这一双手，挽救了无数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。他们康复后，有的考上了大学，有的娶妻生子，有的创办企业，有的参加国际运动会，每每回想起这样的场景，我不禁充满了前行的动力。我高中毕业后，体会到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，也因为此，心中萌生了这样的初心：让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。多年之后，这一初心仍然影响着我的言行和选择。而国家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，让我的初心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
若说在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，我觉得有三个：童年、大学和博士。童年的启蒙让我成为怎样的人，大学的教育让我成为一名医生，博士研究让我走进了肝移植领域。1973年我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，之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做了十年的住院医师，当时我在外科，医生在手术时打开病人腹腔后发现是肝癌，只能又缝回去，因为那时还没有肝移植手术，病人只能等死。作为一名医生，那种痛苦可想而知。最初十年的工作经历，让我意识到要改变目前的医疗水平，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。1986年，

我考取了华西医科大学肝胆胰外科的博士，我攻读肝胆胰外科，就是要摘下肝移植这顶“王冠”。1990年，我考取了香港大学CMB资助的奖学金，开始做肝移植研究，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我做了大量猪的肝移植实验研究。

1991年10月我作为第一助手参与了中

港香港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手术，并获得成功，被列为当年中国香港的十大新闻之一。1993年4月，我成功实施了浙江省首例肝移植手术，是一位巨大肝癌患者，肿瘤达6.7公斤，手术非常成功。从



· 1990-1992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CMB资助做肝移植研究



· 1991年10月作为第一助手完成香港首例临床肝移植



· 1992年回浙江开展肝移植动物实验研究



· 1993年4月完成浙江省首例肝移植手术



· 1994年完成首例胰肾联合移植



· 2010年受聘为印尼大学兼职教授，受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赞誉

那以后，直到现在，我完成了3500例左右肝移植手术。其中，接受肝移植手术的病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06天，最大的有70多岁。因为掌握了肝脏移植技术，救活了很多，特别是那些原来不能做肝移植手术和做不起肝移植手术的病人，这是最让我高兴的。

评判肝癌病人是否适合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，原先通用的国际标准（米兰标准）是肝脏肿瘤直径在5cm以下，才可以做肝移植手术。2008年开始，我们团队提出了“杭州标准”，将标准放宽到8cm，肿瘤直径在8cm以内的肝癌病人可做，肿瘤直径在8cm以上、术前血清甲胎蛋白低于400ng/ml的肝癌病人也可以做。这个标准在国际上产

生了重大影响，它使很多原来不能做手术的病人得以接受手术，肝癌肝移植手术受者范围扩大了52%，挽救了许多的肝癌患者，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，为全球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标准。

中国的医疗要走向世界，我们的肝移植技术率先开启了医学一带一路战略。2010年，我受邀赴印度尼西亚大学附属医院开展活体肝移植，一个星期做了4例活体肝移植手术，非常成功。他们院长问我：“你的这些技术是哪里学来的？”我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。当时我真的很自豪，这是我们自主创新和掌握的技术。当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大使章启月三次接见我说：“我们和印度尼西亚建交60周年，你们来了以后，促进了我们的友好关系，这真是一次‘移植外交’。”现在我们中国的肝移植数量和质量都已经领先全球，过去都是我们参考国外技术，现在西方国家都要来学习我们的经验。

21世纪医学的制高点就是器官移植，它带动了一大批学科的发展，能否做器官移植是衡量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医疗水平的重要标志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间，中国的医疗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很荣幸能够成长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，让我的初心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


· 用我最好的年华，最好的技术去挽救患者